

从查理大帝到乌克兰危机
为什么西方如此喜欢仇视俄罗斯

致命的偏见

——俄罗斯—西方的千年之战

〔瑞士〕吉·梅坦◎著

Guy Mettan

侯文君◎译

Russie-Occident:
une guerre de mille ans

从查理大帝到乌克兰危机
为什么西方如此喜欢仇视俄罗斯

致命的偏见

——俄罗斯——西方的千年之战

「瑞士」吉·梅坦◎著

Guy Mettan

Russie-Occident:

une guerre de mille ans

侯艾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北京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致命的偏见/(瑞士)吉·梅坦著;侯艾君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5620-8555-3

I. ①致… II. ①吉… ②侯…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俄罗斯 IV. ①D8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7203号

- 出版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邮寄地址 北京100088信箱8034分箱 邮编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586(编辑部) 58908334(邮购部)
编辑邮箱 zhengfadch@126.com
承 印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98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6.00元

Russie–Occident : une guerre de mille ans
by Guy Mettan

Original publication : © 2015 Éditions des Syrtes, Genève, Suisse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Email: copyright@rightol.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17-9130 号

序 言 | 对吉·梅坦先生大作的断想*

如果记忆无误，我是在巴黎的“俄罗斯文学节”期间，二月里的某天结识梅坦先生的。他当时是一位记者，是瑞士一家非常权威的《日内瓦日报》（Journal De Geneve）的报社社长和主编，现在则是“瑞士报刊俱乐部”（Geneva Press Club）的领导。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著作，同时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我说这些，是为了让读者从一开始就明白，梅坦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严谨认真的人。他不是那种一嗅到某种政治动向就开始飞速炮制应景之作的记者。吸引我关注的并不是梅坦先生的书名——应该承认，书名令我感到异常沉重。该书的书名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

《俄罗斯-西方的千年之战》

《恐俄症历史：从查理大帝到乌克兰危机》

《为什么他们如此喜欢仇视俄罗斯？》

令我感到沉重的与其说是书名本身，不如说是致瑞士读者的小标题（标题三）：《为什么他们如此喜欢仇视俄罗斯？》。在我看来，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是极为悖谬的，因而也令我极为好奇。同时，关于西方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

* 这是本书俄文版序言，本书从俄文版译出，由莫斯科鲍尔森出版社（Paulsen）2017年出版的修订版；俄文译者是玛利亚·阿宁斯卡娅（Мария Аннинская）；斯维特兰娜·布尔加科娃（Светлана Булгакова）。

的态度这一命题本身早已引发我的关注。总之，当梅坦先生请我为他的大作的俄文版撰写一篇序言时，我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很多年前我曾随意翻阅一册非常出色的美国政治漫画，其中一幅令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一面展开的美国国旗下，一个蓄胡子的面目狰狞的人在爬行。他一手举着导火索冒烟的炸弹，另一手拿着刀，头戴一顶有护耳的帽子，帽子上写着“布尔什维克”——很显然，他是一个俄罗斯人。该漫画创作于1918年，这是对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或者，取决于您的政治观点，是对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鲜明回应。但是，无论我们对该事件持何种态度、无论我们对其如何称谓，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该事件将世界平分为两部分，达80年之久。当时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称彼得格勒发生的事件为“震撼世界的十天”。是的，世界无疑是被震撼了，甚至今天（2016年），因爆发革命而诞生的国家已消失25年了，但其留下的回声仍令世界震撼。

西方对苏联诞生的极其消极的反应是绝对可以理解的。我觉得——准确说，不是觉得，因为我对此有十足把握——问题并不在于犯罪的、反人类的斯大林体制，也不在于缺乏对起码的人权准则的遵守、“古拉格群岛”及其千百万受害者，不，问题并不在于此。我还要斗胆指出的是：实际上，对于西方来说——甚至不仅仅对于西方是如此——人权在过去和现在都首先是炮制社会舆论的政治工具。英语中有个术语：**buzz word**（热词）。该词很难恰如其分地翻译，我是这样解释的：就如巴甫洛夫的铃声作用于狗一样，这个词或词组作用于人之后，人就会流下口水。狗形成了条件反射：铃声——肉——流口水，多次重复之后就导致狗在听到铃声之后，哪怕没有肉也会流口水。我们人类与狗并无什么不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权一词对于我们来说会成为“铃声”，这就是一种时髦词、热词、“铃声词”。

言归正传。实际上，对于西方来说，人权状况如何其实是无所谓的，我作出如此断言的理由很简单：亚洲、近东、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权状况都好不到哪里去，但是——请原谅我套用一句话说——西方并不真正为此牵肠挂肚。

我要引用一则道听途说的故事：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谈及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时说：索摩查或许是个龟儿子，但却是我们自己的龟儿子。^{*}这段话是否确实出自罗斯福总统之口或出自另一位总统之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段话高度准确地反映了西方对于神圣的人权观的无耻态度。如果破坏人权的是他们“自家”的“龟儿子”，那就看他的另一面；如果不是他们“自家”的“龟儿子”，那就……

你瞧，西方敌视苏联（请读作“俄国”，因为对于西方来说，这两个概念之间并无很大差别）并不因为那里的人权受到压制；西方持这种敌对态度是有十足理由的：这一新的政治体制在六分之一的地球上终结了私有制，并号召在所有地方终结私有制。想要绕道而行绝不可能。就如俄罗斯人试图绕过自己想要实现的东西一样，正是俄国人威胁了西方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此，头戴护耳帽、手举尖刀和冒烟炸弹、在美国星条旗下爬行的狰狞男子被刻画为俄国人，正表达了美国人对俄国人的恐惧应该超过对黑暗的恐惧。

这里的引人之处在于：这种恐惧症并非理性，也无法证实是正确的，谈不到西方对“红色威胁”的恐惧。这种害怕并非恐惧症，而是对源自苏维埃俄国的威胁清醒评估基础上作出的反应；既然是如此迅速的反应，那么，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之为恐惧症。但是，梅坦先生谈的是西方对俄“千年之战”，当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作者认为俄罗斯-西方大战的根源在于基督教分裂为两部分：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但是，如果说罗马帝国的覆灭并未削弱罗马作为天主教中心的意义，那么，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就将东正教“堡垒”果断迁到第三罗马（即莫斯科），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手、竞争者的，不是拜占庭，而是俄国。梅坦先生认为，这是最关键之处。

我认为，他是对的——但只对了一部分。在俄国-西方的对抗中，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发挥了作用。其中我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鞑靼-蒙古桎梏将俄国同世界的其他部分割裂达 250 年之久。让我们

^{*} 实际上，这段话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霍尔说的——译者注。

回想一下，在鞑靼-蒙古入侵之前，基辅罗斯与我们今天称为西欧的那些国家曾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让我们再回想一下，甚至基辅罗斯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留里克王朝建立的，而留里克代表了西方派别。最后，我们再回想一下：基辅罗斯大公的三个女儿都分别嫁给了法国、丹麦等国的君主。这一切无论如何都谈不到什么“恐惧症”、遑论俄国-西方大战。但是很快就在俄国和西方之间出现了一道帷幕——当然不是铁幕，但也是极难穿透之幕。从当时西方的角度来说，俄国似乎消失了，不复存在。过了近三百年后，鞑靼-蒙古桎梏已被打破，好奇、求财的商人们来到遥远的莫斯科公国，来到莫斯科公国之后，他们惊呆了。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国家的居民虽然外表与他们相似，但规则秩序与他们迥异。特别是英国人查尔斯·弗莱彻（Charles Fletcher）写到这些内容，他是最早描述“古怪”的俄国人的作者之一。

有一次安德烈·康查罗夫斯基做客我的节目，非常尖锐地指出：我国的一切不幸就在于我们和他们长得太像了。比如说，如果我们蓝色皮肤或花色皮肤，那么，“他们”西方人就不会期望我们做事与他们一样。安德烈·康查罗夫斯基继续说，“他们”西方人并不期望中国人、日本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做事与他们一样。为什么不会期望？因为他们与西方人长相不同，因此对他们不抱希望。而我们俄国人与他们长相相似……

这种观点略有一点种族主义味道，但是不能不承认，无疑，其中有些地方说对了。在谈及恐俄症时，人们常常会引用古斯丁侯爵的著作《俄国在1839年》，而我觉得并不恰当。须知古斯丁前往俄国出于两个原因：其一，他想超过托克维尔侯爵，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为其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名气和荣誉，令古斯丁艳羡不已；其次，托克维尔到美国是为了弄清，为何民主制比君主制强大；而古斯丁去俄国是想以托克维尔为标靶，以俄国为例反证君主制相对于民主社会的优势。他是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去俄国的，然而俄国的现实令其美好愿望成为泡影。以至于他难以置信地承认：如果要让我在俄国看到的一切与我极度鄙视的民主制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我宁可选择后者。

对我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要向读者传达一种思想：即俄国并非只是西方强加给俄国的非正义战争的无辜受害者；如果说西方“喜欢仇恨俄国”，那么，西方的这种“喜好”也并非不是空穴来风，何况这还是一条“双行道”。

但是，我所表述的观点丝毫不会贬低梅坦先生的大作的意义。在我看来，这本书妙趣横生、意义重大，因为作者观察的是此前没有任何人具体谈及的主题。我要强调的是：梅坦先生的著作是具体考证，而不是像今日俄国常见的那样泛泛空论：归咎于所有人，将一切都归咎于恐俄症已经成为这种论调的标准范式。梅坦先生的大作是一项立论严谨、论据充分的新闻调查，其所列举的事实无可争辩——尽管说，在我看来，一些结论恰恰很值得商榷。常言道：每个笑话之中都有笑话的成分。所谓无风不起浪。没有缘由的事物是压根不存在的。我并不怀疑，本书必将令许多人深思，重新看待许多重大事件，并对许多已被当成自明真理而接受的东西产生怀疑。

祝您阅读愉快！

弗拉基米尔·波兹涅尔

引言 | “恐俄症”还是“俄国谵妄症”〔1〕?

当代西方的知识阶层（而知识阶层又是决定性的）实际上很不宽容——尤其是对于针对他们的批评很不宽容，整个西方的知识阶层都严格遵从主流趋势。诚然，对于遏制对手来说，起作用的不是棍棒，而是诽谤和经由财政权力的钳制。不信请看看美国那些光彩夺目的主流报纸上，满眼都是偏见和歪曲。〔2〕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我们的多元主义者》，1982年

本书既是本人多年职业经验积累的成果，也是对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回应。

从我在《日内瓦日报》（一份权威而且非常自由的报纸，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担任实习记者的最初几周开始，我就明白了：什么是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是西方报刊和西方国家领导人对待不合他们口味的国家和政治体制推行的。1980年春，我刚刚适应新工作岗位，在日内瓦正好

〔1〕 Русофобия 是作者自创的新词，听起来就如法语中的 fobia 和 folie 的合音。Folie 意为疯狂、偏执、躁狂、谵妄——编辑注。

〔2〕 索尔仁尼琴写下这段话时已经是从小欧洲移居美国之后了。在判断美国媒体的时候，他无疑指的是整个西方媒体——包括欧洲媒体和美国媒体。而在出走苏联之后的最初几年，他是在欧洲度过的——主要是在瑞士度过。

召开了“世界反共产主义联盟”〔3〕大会。当时是休息日，天气很好，资深记者都不愿意去参加其活动，于是就把我这个实习生派去。欢迎会上汇集了世界上最凶恶的独裁者和刽子手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及阿根廷将军们的代表、韩国人以及其他亚洲独裁政权的代表，人数众多。所有人都对自己身着便装感到极不自然，就如一些廉价连续剧里的主角一样，用墨镜把眼睛遮掩起来，但是我觉得，从他们的额头还是能够看出此前戴军帽留下的勒痕。回到编辑部之后，我如实地阐述了自己的所闻所见，因为当时是星期天，谁也没有读我写的材料，文章正常发表了。

第二天早上，我的上司们简直惊慌失措到了极点！我被叫去严厉地申斥一番。我哪里会知道，该报最大的股东之一正是这个“世界反共产主义联盟”的代表？我应该明白的是：独裁政权是各不相同的，独裁政权与独裁政权之间也互不相容。有一些是好的独裁政权，其领导人是亲西方的将军们；还有一些是坏的独裁政权，他们肆虐于俄国和东欧。也不能说，“独裁者将政治异见者投入监狱、拷打政治犯”，应该换一种方式表述：“这是自由世界的捍卫者，他们保护这个世界，防止其被共产主义病毒传染。”

这是我的第一个教训。

数年之后，1985年11月19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晤。这是自从越南战争、苏军开入阿富汗、东欧国家部署美国中程导弹，以及罗纳德·里根于1983年3月提出战略防卫倡议之后，东西方领导人举行的首次会晤。此外，第一次从俄国来了一位年轻的国家首脑，并且携自己漂亮不俗的夫人，这位夫人立即登上了各大杂志的油彩封面，而她本人也因这种梦幻般的知名度而感到兴奋。那一天我刚满29岁，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充溢我内心的希望。同时我也始终感觉到，当时所发生的一切都那么反现实。两大阵营的领导人实现了会晤，我因此而发现真正顽固不化的，恰恰不是那人们预料其会顽固不化的领导人。

〔3〕 现在称为“世界自由民主联盟”，成立于1966年的世界性极右翼组织，目标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遏制和排拒”共产主义——编者注。

立场最灵活、最愿意作出让步和意识形态牺牲的（哪怕是迫不得已），不是美国总统，而是苏联总书记。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条约比金钱都昂贵。他不明白的是：对于里根来说，条约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而西方法学家嚷嚷的“法治国家”无非是一些漂亮辞藻。首先，国家附着于什么之上？要知道，国家并非某种根深蒂固、静止不变的东西。其次，法制也不是一蹴而就、永恒不变的，恰恰相反，在选择走上一条迂回曲折、不可预测的道路时，法制是随着统治集团的利益，以及特定历史时刻占主导地位智力趋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摇摆不定的。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完全是遵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精神，与其说反映了原则，不如说是反映了特定的形势。

实质上，对于西方来说，法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仅仅对于当下有迫切意义，因为明天可能就已经陈旧过时了。法律仅仅是便于发动战争或通过非战争手段夺取新领土，法律本身并非终极目标，而是符合一条众所周知的公理：“我的永远是我的，你的是不是属于你尚待讨论。”戈尔巴乔夫始终不明白这一真谛，最终于1991年重犯错误：作为对北约不将军队开入东欧的口头承诺的回应，戈尔巴乔夫将苏军撤出东欧。几年过后，整个东欧都被北约掌控，北约甚至已经直抵格鲁吉亚和阿富汗——远离北大西洋数千公里之外的土地。于是我就明白了：良好的愿望极少能够导致正确的政策。

这是我的第二个教训。

萨拉热窝的良好愿望

柏林墙倒塌之后四年，1993年9月，作为《日内瓦论坛报》(La Tribune de Genève)的主编，我与各国记者组成的代表团一起前往萨拉热窝。此行的目的是捍卫《解放报》(Oslobodjenje)的独立性，保护其免遭塞尔维亚人的侵犯。在此期间，美国和欧盟已经在民族自决权的口号下决定变更现有国界，挑动南斯拉夫联盟分裂，与此同时却很少关心组成南斯拉夫联盟的各民族的意见。“边界不可侵犯”一词还没有进入西方的语汇，因此，所有人都觉得，重塑从捷克到马其顿的中欧地图，破坏至今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各民族联盟是绝对

正确的。而这已经是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事件迫使西方法学家完全用另一种说法解释国际法之前很久的事了。

例如，1993年，一批权威的巴黎知识分子和法国乃至欧洲报刊的显赫人士定了调子。当时他们众口一词地叫嚷要干预冲突，而且必须阻挡“塞尔维亚野蛮人”的权力。历史已经表明，这些预言注定要在斯雷布雷尼察变成现实。而在1993年，塞尔维亚人就如所有其他人一样，仅仅是一些好战的民族主义者，不更好、也并不更坏，签订一个国际协议、和平公正地解决这次冲突、避免流血冲突也还不晚。于是乎，我们穿上防弹衣、戴上安全帽，前往报社大楼——经过炸弹袭击，已经处于半毁灭状态，该报成为反抗“野蛮人”的象征物，成为记者独立性的支柱，以及多民族国家理想的保卫者。有人安排我们与记者们，以及留在编辑部里的几名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会见，他们被波斯尼亚穆斯林军官们团团围住。自然，他们作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演示了所有我们想要从他们那里听到的东西，所有人都感到很满意。所有人甚至都没有想过，我们其实是在帮助波斯尼亚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做宣传。此人于1970年出版了《伊斯兰宣言》并积极地将伊斯兰教移植到波斯尼亚。

观看这出“喜剧”之后，我决定乘坐联合国驻南斯拉夫保护部队（FORPRONU）^{〔4〕}的首次航班飞往意大利。《解放报》是萨拉热窝最大的报纸，此前一直体现了独立和多民族理想，现在已经变成了政治讽刺画报，开始表达波斯尼亚的利益，并发起宣传——当时还没有称之为穆斯林的宣传。我们作为记者，试图捍卫被粗暴践踏的自由，却成为一个阵营反对另一个阵营的帮凶。我们被打造成一件战斗武器。作为记者的我们，本应该不偏不倚地倾听冲突各方意见并揭穿骗局。我们已经忘记，要让真理获胜，必须首先让全部真相发声；报刊应该避免道德说教，因为这些道德说教常常会掩盖那些自身不想被提及的人在其中的利益。

这是我的第三个教训。

〔4〕 联合国驻南斯拉夫保护部队，负有在南斯拉夫境内的维和使命，1992年~1995年间在南斯拉夫境内活动。

第四个教训比较具有私人性质。1994年，就在因苏联解体而导致的危机至高峰时刻，我有机会收养了一个俄罗斯女孩。她出生在苏兹达尔，名叫奥克萨娜，我们是在距离莫斯科180公里之外的弗拉基米尔幼儿园得到她的。当时她刚满三岁。我们去领养她的时候是在一个阴郁的十二月的日子，风雪怒吼。这是我生平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最终，按照叶利钦时期通过的法律，我获得了俄罗斯国籍。这就完全改变了我对俄罗斯的态度。如果说，以前支配我的是对后共产主义时期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事件感到好奇，那么，现在我感到自己在参与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我得出一个结论：要不偏不倚地判断这个国家——就如判断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一样——必须不再仇视她，而是要开始对其有深入体验。

这就是我的第四个教训。

置身这种全新的优越位置，我开始消极看待我的同事们对南斯拉夫和俄罗斯所发生事件所作的报道。当我发现，西方媒体用如此多的偏见、成见和一些陈词滥调影响大众的看法时，我犹如被雷电击中一样感到震惊。我在世界各地旅行得越多，就越多地看到，将西欧和俄罗斯区隔开来的误解鸿沟就越深。

索尔仁尼琴：一个极度热爱俄罗斯的人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对索尔仁尼琴的态度令我感到惊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出版他的著作，赞颂他，在他的头上罩上一圈持不同政见运动先行者的光环。当他开始批评共产主义俄国时，我们把他捧到了天上。而当他移民，且不再参与反共座谈会，宁可一个人待在威尔马特工作之后，西方媒体和大学都开始对他反戈一击。

他们的偶像开始不再符合他们为其塑造的形象，他开始妨碍他们的学术生涯和记者生涯。当索尔仁尼琴返回俄罗斯，奋力捍卫受尽屈辱、惊慌失措、被廉价拍卖了的祖国，提高了反对“西方派”和自由-多元主义（他们为了从资本主义的食槽里叨一块肥肉而抛弃了俄国）的调门时，西方就放出所有恶犬对他狂吠。对于西方来说，他已经成为一个发疯的老头——尽管说，实际上他恰恰从未改变，

他开始以同样的热情批评市场极权主义造成的恶果，正如他曾以同样的热情批评共产主义极权制度造成的恶果一样。

他被诋毁、被蔑视、被泼脏水，这么干的正是以前欢迎他早期言行的那些人。他竭尽全力反对的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那些人，他们试图堵住他的道路；而他捍卫的始终是同一个理念：他是俄罗斯的一座山。由于他笔锋一转针对曾经热情接待他的西方而不被谅解——西方认为，作家至死都应该感谢他们；尽管说，索尔仁尼琴永远做的只是一件事情：履行自己的职责。一日为持不同政见者，终生为持不同政见者——这就是他的座右铭。必须记住这一点。

很快又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件，令我变得慎重起来。事情发生在叶利钦统治初期的1993年，整个西方媒体都在鼓掌欢呼，观看坦克如何轰击议会；后来，俄罗斯最知名的几位物理学家被迫关闭实验室，在麦当劳卖汉堡，因为他们已经没钱付房租了；然后，西方的“专家”们为伊斯兰恐怖分子辩护，这些恐怖分子在车臣对俄罗斯人打游击，杀害了几名人质；然后，这些恐怖分子炸毁了纽约的“双子塔”，对西方切断了来自东方的石油；“专家”们从内心深处感到气愤。此外，我们的大众传媒掌控着后苏联的寡头们，而寡头们控制了本国的自然财富，为的是以后能够“为了民主和贸易自由”而将这些自然财富卖到西方；实际上却是用聚敛的钱为自己买个英国足球俱乐部或参加总统竞选（情况与此大致相似的是乌克兰，例如，季莫申科就是这样获得总理职位的）。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判断，双方只获取关于对方的讽刺画式的、阉割过的信息，无论对于俄罗斯还是西方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例如，2014年在基辅独立广场（马伊丹广场）爆发了骚乱，最后演化为一场国家政变，然后又变成一场内战，西方媒体对此的反应是又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歇斯底里。于是我就明白了：我不能沉默，不能对指责者们（他们认为，攻击俄罗斯的动机是必须回击俄罗斯的“宣传”）的歪曲性言论不作回应。

我希望，即使不能摧毁偏见的藩篱，也要尽力使其变得不再不可逾越。我开始着手撰写这部著作，深入到复杂难解、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历史深处，考察西方对俄罗斯的扭曲观念是何时产生并形成

的。我的考察是从查理大帝与拜占庭帝国关系决裂的时代开始的。

恐俄症牢固植根于西方政府和西方的报刊编辑部中，今天已达到歇斯底里和丧心病狂的地步，但却并非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我在本书中偏偏要努力表明这一点，本书的唯一目的就是说服读者，并非一定要仇视俄罗斯，而要与其对话。

顺便还要明确一下（尽管说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本书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并非为了反对西方。理解西方仇恨俄罗斯的根源，绝不意味着要否定诸如民主、自由和人权这样一些文明成就——这些文明成就是西方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开始努力捍卫的；也并不意味着对普京政府有任何兴奋之情。批评西方的不恰当政策，绝不等同于为俄罗斯的失策开脱。

因此也不应该认为，似乎您手中拿到的这本书是一件针对美国和欧洲的防弹衣，如一面镜子般复制了俄国媒体很典型的双重标准战略，将“好俄国”与“坏西方”完全对立起来。本书作者的任务是：考察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复杂的关系发展史，向千千万万俄罗斯人致意，在25年的时间里他们试图在本国建设民主制——但并非外部输入的民主制，而是从内部赢得的民主制；恢复被私有化进程摧毁了的经济；令其未来变得可能：这种未来也不应是外国强加给他们的，而是俄罗斯历史本身的延续。

总之，如果本书有些地方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大众传媒，那么这绝不意味着写作本书是为了反对记者们。全世界有数十万记者在报刊编辑部真诚地工作，但是，他们自身也明白，在面对媒体主人时是何等无助和脆弱，他们无力保护自己免受权势力量、经济机构和政治领导人的压力。以2016年的记者们为例，他们经常会担心失去工作，他们无力抗拒政治正确的要求和通讯社的规定，他们被迫提交自己的材料，以免与现有观念和统治集团的期望相矛盾。记者们的时间很少，独立性有限，他要服从于习惯性力量和融入大众的鼓舞人心的感觉。在这方面，记者们与那些政治家相似：对于他们来说，单独做一个正确者，在政治上就等于死亡；而做一个不正确的人——但是与所有人一起做不正确的人——至少能够确保其政治生命。

如果我的书能够表明，从过去时代沿袭下来的成见并非不可克

服，同时还能帮助阻止这种隐形的大战、持续千年的不睦（这种不睦会从内部耗尽西方，令其丧失自身的一大部分），那么，本书就算是达到了目的。如果从侧面审视自己，我们最终就应该明白：西方并不仅仅是美国和欧洲——就如戴高乐将军所说，甚至也不仅仅是从葡萄牙到乌拉尔的广大土地——不，西方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用大量具体例证表明，西方先入为主的反俄情绪有多么强大：本部分的第一章是专门讨论恐俄症的。第二章谈的是在不久前发生的事件中各种具体的恐俄症表现，诸如乌布林根空难、别斯兰劫持人质事件、奥塞梯战争和索契冬奥会。在第三章您可以了解到，在乌克兰危机期间，西方媒体没有公正地陈述事实、没有对事件进行思考、没有表述与官方说法矛盾的观点。

本书第二部分讨论导致对俄罗斯仇恨的历史、宗教、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及这种仇俄情绪的表现形式。本书考察了欧洲不同民族在 13 个世纪里——准确说，是从查理大帝获得罗马皇帝宝座的那一刻开始的仇俄历史。从查理大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皇帝与教会的权力争夺直到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以及美国人的恐俄症的产生。这种不和最终发展为西方对俄罗斯持续千年的争斗（诚然，为了公正起见，应该说，俄罗斯也曾以同样方式回敬西方）。

本书第三部分讲述了现有的仇俄方法：创造一种专门语言，被学术界和媒体运用；其次是把弗拉基米尔·普京塑造成一个邪恶英雄的形象，将这一形象写入传统神话中；按照这种神话，可怕的、毛茸茸的俄国熊将听从自己的主人，威胁整个欧洲。本书还从这些深刻观念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许多时事，表明：如何能够动员欧洲的“软制度”，对付随时准备吞吃“纯洁、无辜”的欧洲的“恶意”的俄国。

最后，在结论中我将表明：西方之所以绝不接受俄罗斯的异类特质，是由于西方的自我意识还没有最终形成。欧洲被国界所阻隔，又经历了危机，需要一个俄国这样的敌人形象，才能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为了找回自信，西方就如白雪公主的继母一样，时不时地要问问魔镜。但是俄国的魔镜与西方的魔镜不同，不愿意曲意奉承，而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欧洲并非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在东方的